

怀钱伟长先生

谢定裕

我识钱伟长先生也晚，所知亦不深。但钱先生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先生，现在有此机会，愿写一点我与钱先生交往的片段。

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在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接待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招待会上。那是中美开始交流后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到美国访问。代表团除钱先生外，还有贝时璋，张文裕等。因为钱先生的声望和遭遇，大家都围着他谈话，我只有机会交谈少几句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讲的小故事。他说他下放到工厂去劳动，看见老工人在铸好一件产品时，常常埋头用工具在刻写什么。他说，我想他一定在写他的名字，像我们知识分子，一定要把自己名字写在文章的前面，不能让人家占我的功劳。他说他向前一看，才发现那工人写的是产品号码和日期。他那时就觉得十分惭愧。我们当时听了，也颇为触动。

下一次我再见到钱先生已是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。那时钱先生已三年多前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，并于两年前成立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。我就是这天初访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。

那天钱先生待我一见如故，谈了很多。他说他一向主张理工结合，教研结合。可是在清华，因为他不是党员，颇受‘不学无术’者如张维，张光斗等排挤。不让他发表，不让他教学生。他自一九七七年后，就离开清华，到处讲学。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来到上海。

他说上海工业大学是一所三流大学。他来了以后，经过三年努力，大概已可进入为二流大学。

那时大家对三峡工程十分关切。我和几位朋友还刚在“科技导报”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：‘关于长江三峡建造高坝的一些探讨’。我们还正积极准备在年底于纽约主办‘长江三峡工程学术讨论会’。我就当时向钱先生请教他的意见。他说他是反对建造三峡高坝的。他的理由是：一，应该先在支流上建坝；二，这一工程投资额太大；三，如有战争就太危险。

后来，有一次我到北京，他邀我到他在木樨地的府上吃饺子。他说政协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，就是他和孙越崎主笔的。孙越崎在国民政府时代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，就住在他们楼下。

到九零年代，三峡工程要上马了，他没有再对此发表意见。我曾问过他，他说一切既已定案，再反对就是反对中央，所以他就沉默了。

一九八六年以后，我每到上海，几乎都落脚在上海工业大学的乐乎楼。钱先生如在上海，也住在乐乎楼。每次若他有空，我总去拜访。

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，我又见到钱先生。他那时刚从华东医院住院三十三天后出来。这次他谈得比较多，谈一些往事。他说他和蒋南翔在清华念书时是很要好的同学，宿舍住同一房间。想不到后来这样对待他。一九八三年到上海，本来是要他当上海交大校长。上海交大属教育部，蒋南翔不同意。於是想到上海工业大学，不

属教育部。蒋又提出异义说，大学校长年过六十不好。那时钱先生已近七十。邓小平遂下令，由中央组织部调他去上海工业大学，且下了条子：“此人任命上海工业大学校长，不受年龄限制。”他於是成为终身校长。

那时上海工业大学是三流大学，操场上尽是牛粪马粪。没有人想去做校长的。

一九九四年，合并九个单位成立上海大学。有四十二个专业，学生毕业后没有出路。他就下令裁拆。

他提倡：学校与社会结合，科研与教学接合，教师与学生结合，所学与实际结合。要打破这四道墙。

他最后提到，周培源人品不行，靠拍马起家。他自己就不做党员。周也排挤他。当年清华理科转到北大，实在应该让他过去。

二零零八年，我最后一次到上海，虽然同住乐乎楼，已没有办法见到钱先生了。

一九八八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，钱先生担任执行会长。大概是一九九二年，我参加在广东东莞的和平统一座谈会，钱先生是主持人。

钱先生的文采史识，得自家学渊源，尤其受其四叔钱穆大师的培育陶冶。但分裂的祖国使他无法赴台湾在他四叔生前再见一面。中国和平统一心愿的实现也还待我们的继续努力。